

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问题的 若干思考^{*}

刘中民

【内容提要】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关系的分析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命题及其引发的问题:第一,关于海权是全球性大国的必要条件的命题。这一命题引发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理解海权对大国崛起的影响。对此,作者指出多数西方学者都是结合经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等其他因素来强调海权重要性的;历史也表明海权本身并不具有确保国家强盛的神奇功效,国家盛衰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第二,新兴海权国家尤其是陆海复合国家挑战既有的世界海洋霸权,从而引发国际体系的冲突与动荡这一命题。作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并不存在新兴海权国家与既有海洋霸权冲突的历史逻辑,其关键取决于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不同时期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和时代主题的不同。解释模式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两次更迭,并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预测提供一个视角。

【关键词】 海权;大国崛起;大国地位;霸权;冲突

【作者简介】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邮编:20008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07)12 - 0006 - 09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是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和组织上的突破可以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的优势。”这一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言的大国崛起。西方国家关于大国崛起理论的特点及其影响包括:崛起国家具有扩张的本性,“崛起大国挑战现有霸权 造成国际体系的动荡,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领导者的霸权导致周期性的全球战争。有西方学者指出,从两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 20 世纪德国的崛起,几乎每出现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引起全球的动荡和战争。如果进一步放宽视野,审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海权与大

国崛起关系的分析,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命题:命题一,海权是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要条件;命题二,新兴的海权国家尤其是陆海复合国家(兼具陆地与海洋双重属性的国家)在追求海权的过程中扮演着现有海洋霸权挑战者的角色,并引发国际体系的冲突与动

^{*} 本文为 2006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成果;2004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世界海洋政治的发展与中国海洋战略选择”(04JJDZH017)阶段性成果。

以上观点可参见如下文献:Martin Wright, *Power Politic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2001.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

荡。第一个命题引发了该如何理解海权对大国崛起的影响这一问题;第二个命题引发的问题在于其本身的错误逻辑和实践。

当前,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广泛关注,“中国威胁论”构成了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进行舆论反应的一种论调,而“中国海权威胁论”便是美国“中国威胁论”的一种主要表现形态。例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尔(James E. Auer)等人认为中国海权发展构成了对东亚安全以及美国利益的威胁,美国对此必须加以阻遏。美国的东亚战略必须以海权的主导地位为基础。“美国只有在太平洋地区保持足够的力量存在并表明将在必要时诉诸使用的意志,美国才能阻止中国追求东亚霸权的野心。”他甚至提出:“可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比较”,尽管“历史本身并不会重复,但是某些模式是显而易见的。”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也认为中国海权的发展构成了可能诱发中美冲突的因素。“中国近来采取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利用一种使它控制亚洲重要海运线和贸易通道的海上地理环境为目的的。换言之,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现代世界的性质驱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他们认为,在战略层面,中国“正在担负起大国角色”,“这个军事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辽阔的太平洋地区内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它的目标同美国的利益势必冲突。在具体的问题领域,如中国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构成了中美直接发生海上冲突的根源。”

在国内关于中国海权的理论探讨中,也有观点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如有学者认为,在历史上海权是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指出“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发展的保证”,甚至强调中美海权性质的不同势必导致中国海权与美国海权的冲突。“美国是霸权国家,其军事上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对海权的排他性垄断。这样,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海权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与霸权,尤其是海上霸权发生冲突……中国要求走向世界并寻求在这个进程中的安全保障,而美国则不允许中国为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的军事力量走向世界。”“中国与美国的利益,尤其是集中在南中国海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海权利益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因此,在此背景下,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海权与大国兴衰理论中的某些结论进行评判,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回应“中国海权威胁论”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相关内容以及当下“中国海权威胁论”的主要论调,本文主要集中在探讨三个问题:首先,如何科学看待海权对于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性;其次,如何认识新兴海权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关系;最后,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

二 如何科学看待海权对于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性

在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海权论的集大成者马汉特别强调海权对于大国地位的重要性。他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但马汉的分析主要针对海权对某些国家的影响,尤其是结合英国分析了海权对于确定大国地位的重要性,没有上升到从国际体系角度进行分析的高度。

在后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海权的分析逐步上升到国际体系分析的高度。如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认为,16世纪以来,在为期约100年的每个长周期内都会出现一个海上霸权国,其存在对维持国际秩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

James E. Auer, Robyn Lin, "The Maritime Basis of American Security in East Asi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4, No. 1, 2001, pp. 39 - 47.

James E. Auer, Robyn Lin, "The Maritime Basis of American Security in East Asia," pp. 43 - 45.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等译:《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第2~3页。

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第86页。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际安全利益分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美国。他们指出：“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够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过去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在过去的500年中，只有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能成为世界霸权国，因为它们曾拥有的战舰占世界大国战舰总量（同时代）的一半以上，或者其海军军费开支占世界海军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些海上霸权国都分别主导了各自时代的海军技术革新。世界霸权国不仅都是世界海军最强大的国家，它们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领先产业的主导国。对于莫德斯基关于“世界大国”应具备条件的分析，中国学者王逸舟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地理环境看，世界大国必须是有“安全盈余（surplus security）”的岛国或半岛。第二，要能维持海军力量等全球性政治和战略组织、集中拥有占世界整体一半以上的海军力量。第三，必须是“主导经济（leading economy）”，以经济创新能力为中心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国家。第四，国内政治是开放的和稳定的，即便有偶尔的内乱或政局不稳等国内问题，也不足以削弱其对外领导作用。

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以全盛时期的英国为例，指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出现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英国主导建立和控制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其主导世界经济关系的能力对于英国霸权至关重要，并指出了海权对于主导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英国制海权的保护伞下，英国的贸易和投资拥有了进入世界市场、取得原料来源的相对自由的通道。其次，“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第二个主导因素是英国海军的至高无上地位。“欧洲大陆以外实际上没有敢于向英国挑战的国家，直至19世纪后期美国和日本成为重要的海军强国。”最后，他同样看重经济、技术革命因素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2002年发表了《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一文，对过去500年的世界霸权国家实力资源的演变进行了归纳（见表1），国内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主要海权国家崛起模式进行了概括（见表2），从中都可以发现海权构成了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表1 主要国家及其实力资源（1500~2000年）

时期	主要国家	资源
16世纪	西班牙	黄金、殖民地、雇佣军、王朝纽带
17世纪	荷兰	贸易、资本市场、海军
18世纪	法国	人口、农业、公共管理、军队、文化（软实力）、工业、政治凝聚力、金融和信贷
19世纪	英国	海军、自由准则（软实力）、岛屿位置（易于防守）、经济规模、科技领先地位、地理位置
20世纪	美国	军事力量和盟国、普及的文化和自由的国际机制（软实力）
21世纪	美国	技术领先地位、军事和经济规模、软实力、跨国通信的中心

资料来源：[美]约瑟夫·奈：《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载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表2 世界主要大国崛起的模式

国家	崛起模式
西班牙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
荷兰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
英国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
美国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海洋秩序）+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技术创新+软实力

资料来源：根据辛向阳《霸权崛起与挑战国家范式分析》一文的内容整理而成，参见辛向阳：《霸权崛起与挑战国家范式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第98~102页。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949 ~ 199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p. 3 - 26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949 ~ 1993*, p. 106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949 ~ 1993*, p. 25.

曹云华、李昌新：《美国崛起中的海权因素初探》，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5期，第24页。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434页。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37页。

在历史上,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这四个霸权国家均具有海权国家的属性。那么是否可以就此断言,海权是否就构成了世界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必要条件?对此,居于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多是予以肯定的。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强调了海权对于大国地位的重要性,但是多数学者都是结合其他因素(如经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等)强调海权重要性的。对此,笔者认为,海权国家之所以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上扮演了霸权的角色,与近代以来海洋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纽带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海权并非是大国崛起的唯一条件,大国的崛起还与诸如国家领土、人口、文化、制度选择等多种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例如,就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而言,尽管马汉等人不断强调海权对于其霸权崛起的重要性,甚至将海权对于英国霸权崛起的影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也有西方学者指出海权仅仅是其霸权崛起的因素之一,并且是与综合国力等其他因素一起发挥作用促成英国的崛起(如莫德爾斯基、吉尔平的分析)。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英国在20世纪以前的成功有赖于两大支柱:海上霸权和均势外交。”“没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基础,这两大支柱可以说一个都支撑不起来。”

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表明,海权本身并不具有确保国家强盛的神奇功效,国家盛衰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葡萄牙海权兴起后世界海权兴衰所遵循的一条历史逻辑便是,资本的生产与扩张能力是海权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与此相关的对于世界经济的主导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葡萄牙、西班牙海权迅速崛起和衰落的历史便证明了这一点。葡萄牙、西班牙通过海外殖民掠夺的大量财富并未转化为资本,而是转手都流入工业发达的英国、荷兰等国。恰如马克思所言:“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沃勒斯坦也认为,“西班牙衰落的原因似乎是没有建立(也许因为它不能建立)能使西班牙统治阶级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创立中获利的那种国家机器,尽管16世纪西班牙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居于中心的地理经济位置。”“一旦在1588年无敌舰队战败,它的这种国际地位就循着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结论走下去。”

作为葡萄牙、西班牙继任者的荷兰海权的兴衰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荷兰摆脱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后,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其特点是以商业资本为主。伴随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阿姆斯特丹作为连接欧洲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东欧和西欧的纽带,已经“变成欧洲经济的三重中心:商品生产、转运中心和资本市场”。荷兰在商业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突出优势,决定了荷兰海上力量的发展,使其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成为17世纪的海上霸主。英国著名的海洋军事专家安德鲁·兰伯特指出:“荷兰共和国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北海渔业以及波罗的海的贸易,它还从地中海、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等长期贩运中获得巨额商业利润。”但荷兰的繁荣完全建立在商业垄断权而非工业优势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曾指出:“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但是,17世纪50~70年代的三次英荷战争使荷兰的军事和商业威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荷兰从此一蹶不振。“在下一个世纪中,荷兰的海洋经济依然很强大,但再也不能重振雄风,回到1673年挑战英法联军的辉煌岁月了。”英国能够战胜荷兰,主要原因在于荷兰没有本国发达的工业作为贸易的基础,所以在自由竞争中终于敌不过工业资本发达的英国。“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通过考察西方海权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西方海权发展的历史线路是:商业冒险与劫掠式殖民扩张(葡萄牙、西班牙)——商业资本扩张(荷兰)——工业资本扩张(英国、美国),其最根本的历史动力及其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15页。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第232页。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243页。

[英]安德鲁·兰伯特著,郑振清等译:《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3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8页。

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56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页。

支撑因素无疑是资本的生产扩张、经济主导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认识海权对大国崛起的影响,需要结合其他因素予以客观全面地认识,尤其不能离开具体的国际环境与国家的具体情况。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对于海权与国家崛起关系的认识,尤其要摆脱那种强调大国崛起离不开海权支撑,而忽视海权背后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的简单化思维。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列强炮舰面前遭受的屈辱一直激励着我们要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决心。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发展军力是为达成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海上强国梦”。

三 如何认识新兴海权的崛起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关系

在西方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在历史上,新兴大国尤其是陆海复合国家在追求海权的过程中,均不可避免地与既有霸权国发生冲突并导致国际体系的周期性动荡。如马汉就曾针对德国指出,德国作为陆上强国,为了控制来自海外殖民地、海外市场的源源不断的原材料等物资供给,而努力发展成一个海上强国,由此,势必存在与彼岸为邻的海权大国英国的矛盾冲突。那么,新兴国家的海权发展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冲突是否构成了无法逃避的历史“铁律”呢?新兴的海权国家是否具有和平崛起,进而避免与现存霸权冲突的可能呢?笔者认为,在历史中,德国与日本由于对海权的追求确实酿成了世界性的战争,但是英国海权的崛起是武力手段与和平手段兼用完成的,美国海权的崛起过程尽管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扩张完成的,也在局部与既有的海洋霸权英国发生过冲突,但是美国在总体上并没有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而是通过“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威尔逊主义”等总体的、循序渐进的外交战略完成的。因此,新兴国家的海权崛起并非只有暴力方式一种历史路径。对此,西方也有学者指出,威胁不是权力本身天生带有的,如19世纪的英国控制着2/3的世界却依然是“光荣孤立”,美国的崛起也没有引发别国反抗。因此,新兴海权的崛起并非只有暴力冲突的一种模式,同时也有和平崛起的模式,也并没有什么绝对铁律,新兴海权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关系模式在根本上取决于新兴国家自身的战略

选择,同时也深受国际结构特征的制约。下文拟通过德国和美国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一)挑战英国海洋霸权:德国的教训

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完成德国统一以后,德国的迅速崛起,打破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均势格局,但德国面临着如何处理海权与陆权的关系问题。“从军事的观点看,德国的地缘环境极为不利,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均被列强所包围。陆地有俄罗斯-奥匈帝国-法国环绕,海上由波罗的海和北海所限制,德国去大西洋的出口分别被瑞典和英国所封锁,在日德兰半岛还被丹麦所阻断。”为摆脱这种不利的地缘政治处境,俾斯麦确定了亲英、联奥、拉俄、反法的“大陆政策”,并优先发展陆军,德国由此确立了欧洲陆权的主导地位,并保持了与英国海权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也恰如马汉所言:“当前在欧洲只有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但是这种平衡也埋下了双方矛盾的根源,即一旦拥有大陆优势的德国要打破这种平衡谋求海权与陆权的并重发展便势必导致与英国海权的矛盾。

伴随19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海外扩张的开始,德国海外殖民地与英法等国家相比较的劣势促使德国发展海权的欲望愈益强烈。对此马汉精辟地指出:“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大德国’体系更能让德国心满意足;而机会的缺乏又不禁使这个对殖民地的贪欲昭然若揭的国家心烦意乱。”为摆脱地缘政治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大力推行“世界政策”,大力建设海军,露骨地把争夺世界霸权的矛头直指英国。此时适逢马汉的海权理论问世,并被德国的威廉二世奉为圭臬。德国外交大臣比洛德明确表示:“与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海洋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一个国家重要的

唐世平:《塑造中国理想的安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马汉:《海权论》,第151页。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1.

王生荣:《海洋大国与海权争夺》,北京:海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马汉:《海权论》,第129页。

马汉:《海权论》,第147页。

因素……它已成为一条生死攸关的神经,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个蒸蒸日上的、充满活力的民族变成一个老气横秋、衰朽的民族,我们就不能允许这根神经被割断。”阿尔弗雷德·特皮兹(Alfred Von Tpitiz)提出了一种“海军冒险理论,即把德国的海军发展成为一种能使英国感到威胁的军事力量:即使最强大的海权国家想要毁灭德国海军,也必须付出极高代价,这样的风险足以对之起到威胁作用。因此,德国选择挑战英国的海权战略及其积极实践,是使英德矛盾成为欧洲核心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雷夫认为德国的错误在于受到了双重地理特性的困扰:“由于与海洋的联系使它倾向于海上的冒险,就此而论它是一个海权国家,而因它位于巨大心脏地带以西的地区是人口最稠密的边缘,使它至少可能成为一个把心脏地带组织起来的中心区”。

面对德国日渐严峻的威胁,英国广泛结盟,利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纠集力量反对德国。1902年英国同日本结盟,旨在遏制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同时削弱德国在中国的影响;1904年英法两国签订协约,以共同反对德国;1907年,英国与俄国协调了在中东和近东的矛盾,签订了旨在对付德国的协约。这样,以英国为核心的协约国集团形成,其矛头直指德国,与早在1882年即存在的“德奥意三国同盟”形成两大阵营对垒。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本上摧毁了德国海军,并夺取了德国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英国海洋霸权虽然遭到一定的削弱,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仍然占据着世界海上霸主地位。相反,德国则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德国的教训可以总结为:德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其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在于大陆,德国对海权的过度崇拜以及盲目发展海权,背离了德国大陆性为主的地缘特征,海陆两个方向过多树敌而使陆海复合国家双重易受伤害性的弊端加剧,最终其挑战英国海洋霸权的战略选择遭到彻底失败。“随着1918年的战败,不仅‘世界政策’和‘海权’烟消云散,德国的整个‘发展前途’也罩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阴霾”。

在一战后的德国地缘战略中,尤其是卡尔·豪斯浩弗的臭名昭著的“纳粹地缘政治学(Nazi geopolitics)除了对生存空间的强烈要求之外,对于海洋也有一种强烈的渴求。他认为“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

是一个重大事件”。“最理想的是一个国家要具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能够使它对其对陆地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他还坚信陆权和海权的世界冲突的理论,认为陆权与海权的对抗是地缘政治上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其理论再次将德国引向地缘政治的歧途。

(二)妥善处理与既有海洋霸权关系:美国的经验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海权扩张的确构成了其完成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有学者认为,在美国崛起过程中,海权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海权的发展推动了美国国内商品的出口,保护了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崛起。其次,海权成为美国争取独立、扩张领土、维护统一的重要工具。最后,海权成为扩大美国政治影响力,实现美国国际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但是,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其海权战略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美国并没有像前文所述的德国那样直接挑战包括海权在内的英国世界霸权,而是将海权战略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结合起来,进而在规避扮演世界霸权挑战者,相对平静地完成了国家的崛起,其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处理好与当时海权霸主英国的关系,充分利用机遇跳跃式发展。马汉在谋划美国的海权战略时,便特别强调在军事计划中必须包括政治和国际关系,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灵活处理与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的关系。他特别强调了美国与英国合作的重要性:“今天不可能有哪个国家能独霸海洋,英美两国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上建立合作。”他希望同英国达成和解,并以血缘上的特殊关系与之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因为“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国周围拥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最可怕

王生荣:《海洋大国与海权争夺》,第111页。

[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等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第18页。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3页。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4页。

曹云华、李昌新:《美国崛起中的海权因素初探》,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5期,第25页。

[美]马汉著,蔡鸿武等译:《海军战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页。

马汉:《海权论》,第367页。

的可能敌人。”美国海权在其实践过程中,基本遵循了马汉的主张,规避对英国的挑战。1814年《根特条约》的签订开始了英美和解进程。尽管双方的摩擦不断,但从此没有再次发生战争。此后,美国利用英俄矛盾,适时提出“门罗主义”并得到英国的支持。在美西战争中,美国又利用当时英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以在非洲和远东事务中支持英国反对德、法、俄为交换,将英国拉往自己一边。“正是英国的友好行动,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预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与此同时,美国利用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迫使英国放弃“两强标准”,最终使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与英国在主力舰上的平等地位,并确立了对日优势。在一战和二战中,美国利用远隔欧洲大陆的地缘优势,采取“推卸责任”战略,消耗欧洲列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海权大势已去,战后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海权霸主。

第二,借鉴历史上英国成功的经验,善于维持陆上均势,利用陆地强国间的矛盾保持陆上力量平衡。海洋国家一般不与大陆国家陆地相连,不愿卷入大陆强国间的战争,但却把某一大陆强国取得大陆霸权看做对自己威胁的标志。因此,“海洋强国把维持大陆强国间的均势视为自己本土安全的前提。”英国在数百年间,把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作为自己本土安全的前提。由于欧洲大陆国家间的力量发展不平衡,英国频繁更替联盟对象以打击新的争霸者。美国与欧亚大陆的地缘关系类似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美国的地缘战略类似英国的地缘战略,即维持欧亚大陆均势和海上非均势。为此,美国强调:“我们在和平时期就一定要经常注意不让任何国家或几个联盟国家以优势的力量出现在旧世界这两个区域的任何地方,以免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因此,显而易见,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内部实力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政策方向。”美国把利用欧亚强国间的矛盾作为维持欧亚大陆均势的重要一环。如20世纪在欧亚大陆东端,日俄战争前美国利用英国和日本平衡俄国,日俄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俄(苏)、中、英平衡日本等。因此,尽管美国在此过程中也曾在二战后期被卷入战争,但更多的是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在二战结束前,也就是美国在完成其霸权崛起的过程中,并没有挑起和长期参与耗费国力的世界性战争。

第三,在具体问题上采取武力与和平双重手段并

用的策略,并在海权扩张战略上采取了选择英国霸权较弱的太平洋作为重点扩张策略。在对拉美问题上,美国坚持“门罗主义”,排挤欧洲列强对美洲事务的染指。美国的这种策略被某学者总结为:“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大西洋拥有制海权,但在太平洋不是,……美国不强行追求大西洋的海权,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同时也不让英国等欧洲国家染指美洲,这就是‘门罗主义’”。在对亚太问题上,马汉则提出占领夏威夷和与欧洲列强共享侵华利益的“门户开放”等观点,在实践中,美国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战略。

德国与美国作为新兴国家在处理与传统海洋霸权关系上的不同结果表明,并不存在新兴海权国家与既有海洋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其关键取决于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即挑战既有霸权体系,还是融入国际体系并通过灵活的手段实现和平崛起。如果考虑到国际体系的要素,还必须考虑到不同时期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和时代主题的不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冲突构成了二战前国际体系的总体性、结构性特征,其内在矛盾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性扩张政策,殖民地的征服和控制构成了霸权争夺的核心要素之一,而在此过程中,海权力量则具有超乎其他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伴随战后以来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完成以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不断深化,尽管地区性或全球性海权仍然是世界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权的战略重要性依旧存在,同时也是大国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它并不再像战前那样构成大国矛盾的重要因素(如在一战前后大国围绕海军力量比例分配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海权功能也在日趋多元化,尤其是其维护海洋通道安全、处理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合作功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一切都表明,新兴国家在当下的海权发展尽管有可能导致大国间的竞争,但已不太可能由此导致大国冲突。

马汉:《海权论》,第296页。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程广中:《地缘战略规律试论》,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67页。

转引自程广中:《地缘战略规律试论》,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67页。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第18页。

四 如何认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

前文提到的“中国海权威胁论”的主旨思想即中美之间存在着海权冲突。该问题在本质上涉及的是新兴国家与既有霸权国家的关系问题,认识和解读这一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限于文章的篇幅,仅就与海权相关的问题做如下概括性分析。

第一,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中国不可能发展全球性的海权,并对美国的全球海洋霸权构成威胁。作为陆海复合国家的中国始终面临作为陆海复合国家所面临的制约性问题。根据地缘政治规律,双重易受伤害性以及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国家资源分配分散化构成了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政治弱点,决定了它们必须努力在海陆两个方面的发展保持一定平衡,而克服这一弱点,需要极高的外交技巧和谋略,需要高超的决策者选定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发展道路。尽管中国目前在海洋方向面临一系列潜在的危机与压力,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需要在继续经营陆权战略的同时,对海上战略加以平衡甚至进行一定的倾斜,以应对中国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几个棘手问题。但陆地边界的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安全战略中的重心所在。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的观点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他认为,从东亚地缘政治的结构来看,中国的优势与利益在大陆,美国的优势及其利益在海上,中国的陆权能够与美国的海权达成平衡并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地理学决定了中国和美国无论现在还是 21 世纪都是地区内的两个主要大国,它们应该有能力控制两极冲突,保持地区均势和相对和平,把紧张程度降到最低。”具体说来,在当前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只有美国和中国拥有追求地区霸权所需的地理资产。但是受地理影响,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去挑战对方的势力范围。他认为,尽管“中国也具备发展海上势力的地缘政治潜力”,“在 21 世纪头 1/4 的时间里,中国是唯一有可能挑战美国海上势力的国家”,“然而,中国的政治地理影响它的利益并限制它的抱负”。他的基本依据是由于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在历史上中国也从未有过跨水域的领土扩张,“边境安全”在历史上和目前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利益”,由于“中国并不能确保边界的永久安全,因此不能把发展海上力量作为战略和财政的优先

选择。”即使中国力图扩大其海上势力,它也很难与美国的海军抗衡。因此,“中国的大陆利益与美国的海上实力应该阻止北京把发展海军力量置于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他认为美国的战略深度及海军力量,使它不仅在沿岸水域占据优势,更能突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领空。“更重要的在于东亚的大陆领袖不能成为一个有抱负的、在海上‘畅通无阻’的大国。”因而,中国在海上战区始终输于美国,而美国在东亚大陆又逊于中国。中美在朝鲜半岛、南沙群岛、台湾海峡三个热点问题上的博弈都会遵循这一逻辑,但不至于诱发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或酿成中美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尽管上述观点不能完全为我们所认同,其中也暗含了对中国海权发展的警告,但他对于东亚地缘结构中美国与中国利益的分析是相对准确的。

第二,中国外交战略和海洋战略以及多重战略需求使得中国有限的海权发展不可能以挑战美国的全球海洋霸权为目标。有专家指出,当前中国的国家大战略有三种基本需求,即发展需求、主权需求和责任需求。从长远讲,三种需求的满足是互利的,但在局部的时间和空间内又会产生重大矛盾,甚至在同一需求的自身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中国国家大战略要满足多重战略需求这一基本现实,要求中国海洋战略的构建要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的多重战略需求,并有效弥合或减缓不同战略需求之间的矛盾张力,进而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的实现。就主权需求与发展需求、责任需求的关系来说,中国既需要从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出发发展中国的海上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和海洋权益等主权利益,同时又面临着如何规避与周边国家的潜在海洋冲突,进而危及中国发展需求的满足以及负责任的地区和国际大国形象的塑造等问题的挑战。它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需求在于主权需求而非霸权需求,也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海权战略的构建不可能以全方位的远洋海权国家为目标,中国海权发展的性质也不会超出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捍卫海洋主权的需求。因此,

详细论述参见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 10期。

[美] 陆伯斌:《和平地理学:21 世纪的东亚》,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 11期,第 69~73页。

关于这一观点可参见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 307~323页。

中国海权的有限发展绝不是以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为归宿和目的,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多方向的、多样性的安全压力决定了海权的有限性及其满足主权需求的性质,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根本无法建立美国式的全球海洋权力。

第三,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建立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在安全上的相互信任,有助于规避或减少冲突。近年来,中美双方在实践领域建立和加强了海洋安全磋商机制,以减少相互之间因对方军事活动发生误解和判断错误而引发武装冲突或战争的危險,减少进行突然袭击的能力。1997年中美两国就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达成协议。1998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这是中美两国第一份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两军定期讨论海上安全措施;中美舰队相互联系、搜寻和援救行动的程序以及双方海上礼节的说明等;双方将成立工作组或举行特别会议,处理两国海军之间的问题。中美海洋安全磋商机制建立的意义在于:首先,进行定期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有利于减少纷争和促进合作,从而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美军一位将领曾经这样评价道: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是两国间的一座重要桥梁。冷战后,随着美国军事战略重心从欧洲逐步转移到亚太地区以及中国海上军事力量逐步实现现代化,两国海上军事力量近距离活动会越来越多。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有助于双方海空力量避免发生意外事故、误解或错误判断,有利于两国的海上军事安全。其次,中美建立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积极开展海上军事安全合作,可减少相互猜疑和防止战略对立,也有利于加强中国与美国的盟友日本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美、日三边安全关系的良性发展,同时也可减少东南亚国家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担心。由于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不愿看到因海上事件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甚至引起意外武装冲突。

不容否认,目前中国的海洋面临着来自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的现实与潜在的危机与压力。三个问题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台湾问题属于反分裂的中国内政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属于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的外交问题。但从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层面看,三个问题又具有一定的共性,

即三个问题都关涉到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安全,都不同程度地有美国的因素介入其中(尤其是中国台湾问题),因此其最终解决也必将受到美国海权力量的限制。近年来,中国的确有因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主权需求而有限度地发展海权力量的必要性,并被美国视为挑战其亚太主导地位,进而有引发中美关系紧张乃至潜在冲突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在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互动过程中,从中国方面而言不宜夸大和渲染中国海权与美国海权之间的矛盾,同时需要向美国表明中国的立场并力争获取美国的理解;美国方面则应该对中国面临的海洋权益危机及其解决此类危机所需要的海权发展予以理解,进而使双方都能够在认识到彼此海权不同性质的基础上,在主观上规避双方的海权冲突。对此,美国尤其应该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国并非要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更没有将美国驱逐出亚太地区的企图和力量。美国还应该认识到,如果美国要凭借其在亚太地区的海权存在及其同盟体系阻遏中国国家主权追求的实现,美国将冒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同时美国也没有在台湾等局部问题上绝对胜出中国的把握。对于中国而言,也应该认可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权存在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中国没有力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海权存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发挥着平衡该地区局势、维护太平洋海上通道安全的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2007-09-17]

[修回日期:2007-10-26]

[责任编辑:赵远良]

关于该问题的详尽论述可参见钱春泰:《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初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4期。

U. S. Pacific Command Public Affairs, "U. S. Pacific Command Hosts Maritime Safety Meeting with China," June 3, 2000, <http://www.pacom.mil/news/news2000/re107-00.htm>.

Abstracts

Reflections on Seapower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Li Zhongmin (6)

In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ere are two remarkable propositions and related issues on seapower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The first proposition is that seapower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global power. Relatededly, there is the issue of how to understand scientifically the effects of seapower on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most Western scholar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eapower, but they als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conomy,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However, history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no supernatural effects of seapower on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The second proposition is that the new seapower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land-sea countries, challenge the existing global hegemony of the sea, often leading to conflict and turbulence.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no historical logic to conflict between new seapowers and the existing global hegemony of the sea, and the key issue lies in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new seapowers as well as i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m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t various times.

Resources,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the Change of Economic Hegemony: Based on Property Rights Theor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Cai Yiming (15)

“The change in economic hegemony”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how does a non-hegemonic country exceed a former hegemony in terms of economic strength? And then, why and how does the catching-up non-hegemonic power become a new hegemony? Given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decided by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the “exceeding” might occur when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economic hegemony have a positive and large net impact on the non-hegemonic count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whether a change in hegemony occurs mainly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value of the expected benefits from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ies and expected costs. Twice in history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ave provided an effective perspective for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hegemony and they may also provide a perspective on future forecast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Cyclical Logic to the Transition of Hegemony: Modelski's Long Cyc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Weakness

Cui Jianshu (24)

Modelski's long cycle theo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ols in Western IR theories that stud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s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are: leadership is needed in the world system; such a role is derived from global war; seapower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ts establishment;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based on a cyclical model, in which domination by the leading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ormally lasts about 100 to 120 year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theory is that it offers an explicit macro-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